

翁心存與晚清世局 ——以日常生活紀錄為中心*

唐屹軒**

摘要

本文以翁心存為核心，探討道光朝在京為官與致仕返鄉士人的日常生活情況。本文透過翁心存在京時期與同年、同寅的宴遊聚會及士人網絡的編織，解析道光朝朝野士人的合縱連橫與黨派傾軋，並由翁心存返鄉奉養母親的居鄉日常生活樣態，瞭解地方士人對戰爭情報的掌握，以及對地方事務、全國政事的議論。此外，蒐集門生族人科考成績與各式書籍，乃為翁心存日常生活的重心，本文亦有觀察。經由討論，首先可知士人網絡對於官宦前途、人際關係、黨派意識，甚或各式消息的獲取等，影響相當深遠。其次，翁心存在看似對立的兩黨派之間從容應對，亦見道光朝官員往來關係的複雜性。最後，從翁心存與摯友祁寯藻的密切聯絡所見，晚清的地域認同與南北之爭等現象仍有討論空間。是故，翁心存的日常生活雖僅一小片段，卻能反應清代中晚期的時代脈動，並延伸出許多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

關鍵詞：翁心存、晚清世局、士人網絡、日常生活、情報訊息

* 本文承蒙三位匿名審查者與《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提供寶貴意見，並糾正文中多處舛誤和文字謬誤，謹此敬致謝悃。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清史研究早在道光廿二年（1842），魏源（1794-1857）撰述《聖武記》即揭開序幕，開啟時人研究清史的先河。¹降至晚清民初，清史更成為研究重點，包括孟森（1868-1938）、梁啟超（1873-1929）、蕭一山（1902-1978）等人，均有重要且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²1937年，中國共產黨為了否認日本侵略戰爭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轉而強調西歐對中國的衝擊，將「鴉片戰爭」（1840-1842）視為中國近代的起點。³其後在革命史觀指導下，諸多論著以革命為歷史論述主軸，不斷強化革命的正統性與合法性，並據此批判晚清以降的歷史發展。⁴緣此，相關研究泰半聚焦明末清初、盛清治世或鴉片戰爭後的歷史，對嘉道時期多有忽略。⁵近年針對嘉、道兩朝（1796-

¹ 清·魏源，《聖武記》（道光甲辰年鐫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藏書號：リ08 00677；陳鵬鳴，〈魏源《聖武記》初探〉，《書目季刊》，29：2（臺北，1995.9），頁47-55；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125-145。

² 參見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孟森，《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蕭一山，《清代通史》（北京：蕭一山自刊，1923）；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³ 岡田英弘，〈世界史のなかの大清帝国〉，收入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頁68。

⁴ 「革命史觀」影響史學研究的相關討論，參見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⁵ 菊池秀明教授認為，因嘉道年間夾在近現代史與明清史之間，易受忽略，加上此前資料較少，故研究較為不足。羅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更具體指陳：早在1978年，《劍橋中國史（十）·晚清篇1800-1911（上）》（*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一書中已有曼素恩（Susan Mann）、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合著專章“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論析嘉道之際的王朝衰落與內在弊病等，儘管議論發人深省，卻因極具權威性，鮮有研究者挑戰或對話，致使清中葉相關研究仍未獲重視。參見菊池秀明，《清代中国南部の社会変容と太平天国》（東京：汲古書院，2008），頁3-8；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師江然譯，〈乾嘉變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清史研究》，2012：3（北京，2012.8），頁150-156；Susan Mann Jones and Philip A.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1820；1820-1850）學術文化與時局世變的討論，當以王汎森院士首開先河。⁶然至2019年7月，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教授在一場「乾嘉變革的再思考」演講中，仍強調有許多議題尚待開拓。⁷其中，如何細緻辨析清中葉士人在中央和地方的角色、及其與時代發展的關連性等，仍可進一步探究。

清代常熟翁氏興於翁心存（1791-1862），其父翁咸封（1750-1810）僅考取舉人，官至江蘇海州學正，主要負責地方基層教育行政工作。⁸翁心存自道光二年（1822）中進士後，歷任中央要職、授讀皇子，影響力不言而喻。稍後，長子翁同書（1810-1865）考取道光庚子科二甲進士，累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日講起居注官與安徽巡撫與右都御史等職。次子翁同龢（1814-1877）雖僅為廕生，亦歷任湖南按察使、布政使、四川按察使、陝西布政使、陝西巡撫、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等地方大員。三子翁同龢（1830-1904）自咸豐丙辰科狀元及第後，旋供職京師，出任各部侍郎、尚書等職，晚年入值軍機、在總理衙門行走，更係同、光兩朝帝師。檢閱翁氏父子四人履歷，充分說明在其父子兩代努力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07-162.

⁶ 如王汎森院士在2003年刊行《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之際，強調道光時期的思想變化及其重要性。2008年，以〈儒林傳〉排序議題和顧炎武崇祀風潮為例，探討嘉道兩朝官方意識型態與學術思想、社會文化等力量，相互交織、轉變的情形。2012年，更專論道咸之際禁書復出的時代新意義，提供吾人重新認識清中葉學術思想與時代脈動的密切關連。參見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自序〉，頁i、頁iv；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臺北，2008.3），頁63-93；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頁415-449。

⁷ 許明德，〈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教授演講「乾嘉變革的再思考」紀要〉，《明清研究通訊》，75（臺北，2019.1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787〉（2019/10/18）。

⁸ 翁咸封的生平，參見清·唐仲冕，〈翁咸封〉，收入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揚州：廣陵書社，2007），第12冊，卷257，頁8116-8117；清·鄭鍾祥、張瀛修、龐鴻文等纂，《光緒常昭合志稿》（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22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27，〈人物六·耆舊〉，頁433。

下，翁氏家族已躋身清中葉權力核心，影響力不容小覷。是故，翁心存與道光朝，乃至晚清歷史的發展脈動息息相關，以之為核心，梳理其在京和居鄉期間的日常生活樣貌，或可作為觀察士人與世變之間緊密聯繫的重要線索。

早在 1925 年，翁同龢的日記在張元濟（1867-1959）主持下，即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刊行，其重要性已受到學者關注。⁹如林文仁教授對晚清政局南北之爭與帝后黨爭的討論，便涉及翁同龢的政治立場、人際網絡等。¹⁰然此前除了以翁同龢為核心的研究外，由於缺乏相關史料，故對翁氏家族相關研究未能進一步開展。自 2011 年《翁心存日記》、2013 年《翁心存詩文集》出版後，翁心存三子及其子孫的函札、日記等亦相繼印行，提供吾人深入解析翁氏家族自清中葉以降與時代脈動的密切聯繫，也讓相關研究漸次獲得重視。¹¹此外，針對地方仕紳權力變化、仕紳身分意識轉變、地方民變等多重面向議題均已受到學者關注，¹²而羅曉翔教授的新作，重新審視地方紳權在清中葉的消長，修正以往認為紳權逐步擴張，及其對地方強大掌控力的印象，提出紳權在清中葉即面臨信任危機。¹³相關討論中，較令筆者在意的是：具有中央重臣與地方仕紳雙重身分與經驗的翁心存，究係如何觀察和應對道光朝弊病？緣此，本文擬以翁心存為核心，藉由其日常生活紀錄，解析清中葉士人在京與居鄉的日常生活及其作為，梳理翁心存與黨派

⁹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¹⁰ 林文仁，《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 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林文仁，《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以「帝后黨爭」為中心的探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¹¹ 參見封磊，〈一個京官的日常生活——以《翁曾翰日記》為中心〉，《常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2（常州，2018.3），頁106-116。

¹² 趙思淵，〈十九世紀中葉蘇州之「大小戶」問題〉，《史林》，2012：6（上海，2012.12），頁77-86；趙思淵，〈士氣之藩籬：清末常熟清賦中的士紳身分意識轉變〉，《歷史研究》，2016：6（北京，2016.12），頁70-85；郭燕紅，〈從常熟均賦到昭文民變——清道光晚期江南社會危機透視〉，《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3（重慶，2016.5），頁169-176。

¹³ 羅曉翔，〈晚清江南社會的紳權與信任危機：以常熟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3（臺北，2019.3），頁47-89。

網絡、時局世變的緊密聯繫。¹⁴

二、翁心存的京官生活初體驗（1822-1838）

嘉慶廿一年（1816），翁心存應江南丙子科鄉試，獲座師湯金釗（1772-1856）、陸言（?-1832）以及房師林沛賞識，以搜落卷中式而為舉人，遂得入都參與會試。嘉慶廿二年（1817）、廿四年（1819）、廿五年（1820）屢試不第，期間得史致儼（1760-1838）、戴均元（1746-1840）等人延為家庭教師課其子弟。直至道光二年，高中壬午恩科二甲進士，座師為英和（1771-1840）、汪廷珍（1757-1827）、湯金釗、李宗昉（1779-1846），房師魏茂林（1772-?），入翰林院為庶吉士、編修。道光九年（1829），奉旨入直上書房，並先後擔任惠郡王綿愉（1814-1865）、咸豐帝（奕訢，1831-1861，1850-1861在位）與恭親王奕訢（1833-1898）的師傅。期間考差外放，擔任福建、順天、四川與浙江鄉試考官，廣東、江西學政，奉天府府丞兼學政等職。十八年（1838），因母老乞養，幾經陳請特旨俞允，返回江蘇常熟住處。廿九年（1849），丁母憂結束，道光帝（旻寧，1782-1850，1820-1850在位）於召見翁同書時，詢問翁心存居家情形，並傳旨回京復職。直到同治元年（1862）病逝為止，翁心存皆在京任職，深獲咸豐帝和兩宮太后器重。緣此，道光二年到十八年是翁心存第一回京官時期，道光廿九年到同治元年為第二回京官時期。翁心存第一回京

¹⁴ 本文雖以「日常生活」為題，但和過去頗受重視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不盡相同。雖同樣以貼切士人的日常生活紀錄出發，但關懷核心聚焦於士人和人際網絡、政治黨派、時局世變之間的聯繫，藉以梳理清中葉歷史發展的脈動。至於翁心存的健康醫療、飲食特色、消費品味等與日常生活有關之活動，有待日後討論。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成果與省思，參見邱澎生，〈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辯證〉，《新史學》，17：4（臺北，2006.12），頁1-14；連玲玲，〈典範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新史學》，17：4（臺北，2006.12），頁255-281；常建華，〈日常生活與社會文化史——「新文化史」觀照下的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12：1（北京，2012.1），頁67-79；常建華，〈他山之石：國外和台灣地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啟示〉，《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合肥，2015.1），頁15-25；余新忠、郝曉麗，〈在具象而個性的日常生活中發現歷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2（北京，2017.6），頁82-95。

官時期，正值道光帝即位之初、鴉片戰爭爆發前夕，係清中葉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同時，翁心存初次在京任官期間的活動，對其日後宦途影響甚鉅。是故，以下將先聚焦於翁心存第一回京官時期的活動，藉以探問清中葉在京士人的日常活動，並嘗試解析翁心存身處的道光朝朝野、滿漢士人的互動。

（一）同年宴遊聚會

從士人考取初階功名伊始，便開始編織個人網絡。隨著科舉之階拾級而上，更開啟錯綜複雜的人際網絡，包括：座師、房師、同年／年友、年伯、年姪、年世伯與年世叔等。¹⁵每科士人均會編纂《登科錄》和《同年齒錄》，儘管有些名冊遲至十年、廿年後才編成，資料內容難免失真，但這些名冊如同時下各式社群網絡，成為士人搜尋彼此聯繫的重要憑據，¹⁶或不肖人士的詐騙藉口。¹⁷

翁心存居京期間，每天酬酢範圍即以同年、同寅為主。入直上書房期間，翁心存和輪值南書房者同在澄懷園值廬，有：龔守正（1776-1851）、杜受田（1787-1852）、徐士芬（1791-1848）、賈楨（1798-1874）、孫瑞珍（1783-1858）、吳鍾駿（?-1853）、祁寯藻（1793-1866）、許乃普（1787-1866）、吳其濬（1789-1846）、單懋謙（1802-1879）

¹⁵ 商衍鑒，《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頁116。

¹⁶ 《登科錄》或《同年齒錄》，係登載士人家庭背景、任官官職、官品等。陶澍在為其同年新刊的《壬戌齒錄》賦詩紀念時，便提及洪守愚為重新刊刻《同年齒錄》，遍尋吏冊中同年官階升轉記錄，甚或四處致函尋問，且已謄寫六次之多，顯見編纂《同年齒錄》工程繁複。參見齊如山，《中國的科名》（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頁78；商衍鑒，《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114；清·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兩淮淮北士民公刊本，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藏書號：55037234），卷58，〈洪守愚同年重訂壬戌齒錄告成賦五言六十韻紀之〉，頁23b-27a；何炳棣著，徐泓譯注，《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125。

¹⁷ 翁心存在日記中即有一則記錄：「有李寶森者以母壽發帖來，云是壬午同年李榆村刺史培謙之子，詢諸滋園，乃并無是也，都中譸張為幻者類如斯矣。近有無賴子設局騙，專好自稱為年姪，始尚有售其欺者，今眾皆知之，相戒不受其紛矣，可發一大噱。」參見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2冊，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四日條，頁727。

等人，退直後時相過從，交往密切，甚或聚會暢談至深夜閉城始歸。¹⁸道光十八年，梅曾亮（1786-1865）更和翁心存與其他在京王午同年約為「真率會」，一同談天作樂。¹⁹此外，與程恩澤（1785-1837）互動密切，時常「談至曠黑，踏月而回」。²⁰程恩澤更曾致贈一幅楹帖，「東海南溟選士造士，三天六館經師人師」，翁心存雖自云愧不敢當，但亦自認頗為貼切。²¹緣此，當程恩澤病逝後，翁心存痛言：「不獨吾黨少一畏友，即國家亦少一實心效力之良臣，殊可痛惜也，為之不怡者累日。」²²這段話不僅道出翁、程兩人的深厚情誼，更透露翁心存心中有一「黨派」想法，劃分出我群與他群的界線。道光廿年（1840），翁心存從邸鈔上得知程恩澤棺柩被撬之事，更為此頗為傷感。²³

除與在京同年密切互動外，亦有不少好友已派任各地，翁心存考差外放時，便可藉機與同年敘舊聚談。如典試廣東之際，與陸我嵩、黃宅中（1796-1863）、滕子玉、陳塏、武耀曾諸同年，一起在小西湖泛舟遊樂。離去時，此回拔擢的門生更設席餞別，與會者達 48 人，其中還包括林則徐（1785-1850）四弟林霈霖（1796-1839）。同時，林則徐與其表兄曾輝春（1770-1853）——即翁心存同年摯友曾元海（1797-1833）之父，亦前來送別，林則徐更與翁心存

¹⁸ 參見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到廿四日、十七年五月三日到八日條，頁117、頁250-251。

¹⁹ 清·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枧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6，〈同年為真率會酒二壺菜五簋恐有以豐腴敗約者詩以誌之〉，頁553。

²⁰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九年二月十一日、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十五年二月廿二日、閏六月十三日、十二月七日、十七年二月廿三日到廿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十日條，頁76、頁117、頁126、頁149、頁188、頁235-236、頁240、頁245。

²¹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條，頁189。

²²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七年八月二日條，頁270。

²³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二十年二月廿五日條，頁354。

晤談良久。²⁴出任江西學政時，更沿途與丙子鄉試同年知縣彭世昌、壬午恩科房師魏茂林、同年舒恭受（1790-1850）族祖署州牧候補知縣舒化民（1782-1859）、州牧張應雲、南昌知縣石家紹（1791-1840）等多人相會，而在外任職的同年友，無不熱情接待翁心存，暢談良久。²⁵上述所引只是一小片段，然略可說明翁心存在京及考差外放期間，與同年、同僚的密切互動。²⁶

可惜的是，翁心存的日記或詩文集文字，並未透露與同年聚談的明確內容。但與翁心存年代相近的王慶雲（1798-1862），也許能提供我們進一步探問同年互動的線索。王慶雲係道光九年（1829）進士，直至咸豐三年（1853）外放為陝西巡撫前，均在京供職。道光十七年（1837），翁、王兩人已有交集，咸豐初年曾短暫一同供職於京，王慶雲外放後，仍與翁心存有書信往來。²⁷其日記透露同年聚談內容廣泛，包括學術思潮、政務弊病、各種亂象等，甚至在上疏奏事前，彼此交換意見。顯現士人深厚的同年情誼，一同縱論時事、上疏言事，並藉此建立緊密網絡。²⁸

不論翁心存或王慶雲，均曾透露與同年聚談樂無窮。²⁹由於京

²⁴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五年入粵紀程、九月廿四日條，頁37-38。

²⁵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七日、除夕、十三年正月一日、廿三日條，頁77、頁79、頁85、頁87、頁97。

²⁶ 有關翁心存日常與師友間的會談拜謁活動統計，可參見文末「附錄」，或可對其人際活動有更多認識。

²⁷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七年八月五日條，頁271-272；同書，第3冊，咸豐三年正月廿六日、五月二十日、咸豐五年二月十日、三月七日、十三日條，頁947、頁982、頁1012、頁1018、頁1019。

²⁸ 清·王慶雲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點校，《荊花館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上冊，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初一日、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八月初八日、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二月初九日、三月十九日、廿一日、廿七日、五月十八日、七月二十六日、九月初七日到初八日、二十六日、十二月十三日、咸豐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六月初二日、初五日條，頁57、頁65、頁67、頁106、頁127、頁132、頁157、頁162、頁167、頁170、頁176、頁183、頁191、頁195、頁211、頁242、頁257-258。

²⁹ 如道光十五年，曾望顏、黃德峻招集翁心存等人一同觀劇，翁心存在日記中記述：「因得與諸同年暢敘，蓋十年來少此樂事矣。」道光廿九年，翁心存結束丁

師聚集大小官員、翰林們，以及赴京趕考之舉人，毋須負擔繁重的行政庶務，因此在京士人的雅集聚會活動極為頻繁，甚至成為他們每日生活重心。儘管士人開心聚會，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有時筵席之費已逾萬錢，故早早即有士人倡議應以簡樸為宜，否則同人聚會不易長久。³⁰

（二）道光朝黨派的再認識

昔人多謂道光朝前後有二大重臣左右朝政，即曹振鏞（1755-1835）、穆彰阿（1782-1856）。緣此，道光之際政局發展、人才晉用無不受曹、穆兩人影響。³¹穆彰阿一派更有「穆黨」之稱，對鴉片戰爭前後政局發展影響甚鉅，時人對此已有若干記述，顯見穆彰阿的專權恣肆及其對政局影響。³²但有關道光之際朝野大臣的合縱

憂返京任職後，與梅曾亮、蔡賡颺、溫葆淳、李菡、蔡紹洛、汪于泗與顧椿等同年，齊集李菡寓邸，此乃闊別12年之久的同年聚會，讓翁心存感喟不已，眾人暢談至晚間9點始散。參見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五年二月十六日條，頁124-125；同書，第2冊，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廿二日條，頁714。

³⁰ 如早在乾隆四十一年，翁方綱便曾為了避免花費巨資在聚會活動上，特意致函朱筠建議嗣後除餞行、祝賀外，雅集的筵席菜色應以簡樸為宜，否則耗費甚巨，堪抵寒士10日伙食費，同人聚會將不易長久。參見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94；清·王慶雲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點校，《荊花館日記》，上冊，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初九日條，頁65。

³¹ 相關討論，參見魏秀梅，〈曹振鏞政績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臺北，1999.6），頁51-87；劉海峰，〈「穆黨」對道光朝晚期吏治的影響〉，《史學月刊》，2007：3（開封，2007.3），頁46-50；凌索超，〈論曹振鏞的治學與為政——關於「清慎勤」的解讀〉，《哈爾濱學院學報》，34：8（哈爾濱，2013.8），頁98-101；顧文婷，〈清代歙縣雄村曹氏家族詩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8）。

³² 如趙烈文謂，不論用人行政，皆操於穆彰阿，致使士風大變，國事日非；汪士鐸則描述穆彰阿個性巧佞，「以欺罔蒙蔽為務」；孫震鏡云，穆彰阿權傾中外，莫之敢撓。王鼎欲奏劾之，卒以尸諫，然陳孚恩未敢上奏，轉呈穆彰阿，穆彰阿改以「暴卒」上報，未進奏疏；李岳瑞則指陳穆彰阿用事既專且久，督撫奏事內容無不預聞，尤私揣上意，粉飾太平，下情無法上達，終至爆發洪楊之亂；龍啟瑞致書梅曾亮，隱諱傳達廣西巡撫周之琦視穆彰阿意旨行事，就連野史中對穆彰阿的專擅也有生動描述，連潘世恩亦知之甚詳。參見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標點本，長沙：岳麓書社，2013），第1冊，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條，頁516。

連橫、派系角力等，卻始終缺乏更多直接史料可供證明。倘若翻閱《翁心存日記》，可知翁心存亦參與道光朝政事頗深，且位在中樞，對朝野大臣互動皆有一手觀察，或可提供吾人重新認識道光朝黨派，進而縷析其中關鍵問題，藉以獲致道光朝政局情況。

論及翁心存的政治立場，第一印象應是與林則徐黨人的密切聯繫。如前所述，翁、林兩人關係匪淺，日記中，翁心存更曾特別記下「見面十四次」，³³且在林則徐家傳「飼鶴圖」中亦有題詠，³⁴可見翁、林兩人交情。此外，翁同書與鄧廷楨之子鄧爾恒（?-1861）係順天鄉試同年。道光廿三年（1843），兩人更一同擔任廣東鄉試考官。翁心存在自訂年譜中述及此事，稱翁、鄧兩家有累世通家之誼。³⁵

另，翁心存道光壬午恩科進士的座師湯金釗，在鴉片戰爭爆發後，其態度與穆彰阿多有齟齬，不附合議，遂遭排擠。³⁶而翁、湯兩家關係至為緊密，因為除了維繫與同年的感情和建立網絡

清·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148；清·孫靜庵撰，張明芳點校，《棲霞閣野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頁18-19；清·李岳瑞撰，張明芳點校，《悔逸齋筆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頁194-195；清·龍啟瑞撰，呂斌編著，《龍啟瑞詩文集校箋》（長沙：岳麓書社，2008），〈上梅伯言先生書一〉，頁423-426；老吏，《奴才小史》（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頁311。

³³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七年正月廿七日條，頁229。

³⁴ 參見黃澤德編，《林公則徐家傳飼鶴圖暨題詠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頁32。

³⁵ 翁心存在《自訂年譜》的跋語中云：翁心存五世祖翁長庸與鄧廷楨五世祖鄧元昭「同為丙辰、丁亥鄉、會試同年……公之五世孫為嶧筠制府廷楨，制府公父子久編修鄧爾恒與兒子同書同舉壬辰順天鄉試，又同為癸卯廣東鄉試考官，累世通家，殆有前定」。參見清·翁心存，《蓼野自訂年譜》，轉引自：謝俊美，《翁同書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9。因遍查臺灣地區「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與「MetaCAT+即時跨館整合查詢」等，均未收藏《蓼野自訂年譜》一書，故只能轉引謝俊美《翁同書傳》的內容。

³⁶ 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364，〈湯金釗傳〉，頁11428。

外，和座師或房師的交情，更可能左右未來仕途。³⁷《翁心存日記》中隨處可見師生二人頻繁互動，除了固定的拜年、賀壽外，平日亦時常聚餐、宴遊、論學。雙方甚至在道光十七年結為親家，由翁同龢迎娶湯金釗長孫女，兩家關係更形緊密。³⁸在日常互動或結為親家之餘，禮物和金錢的饋贈更不可少。道光廿八年九月，在翁同書給翁心存的信函中，可知嘗寄贈湯金釗次子湯修（1811-1871）三百兩。³⁹另，從翁同龢寄給其子翁曾翰（1837-1878）的信函中，更可看出其經營家族和個人網絡的用心，包括年節致

³⁷ 最廣為熟知的例子，即穆彰阿大力提拔曾國藩，助其飛黃騰達的軼事。野史中有一段生動描繪：「穆彰阿嘗汲引曾文正公國藩，每於御前奏稱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見之諭。是夕，宿穆邸，及入內，內監引至一室，則非平時候起處。踰亭午矣，未獲入對。俄內傳諭：『明日再來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問奏對若何，文正述後命以對，並及候起處所。穆稍凝思，問曰：『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文正未及對。穆悵然曰：『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則召幹僕某，諭之曰：『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屬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因顧謂文正，仍下榻於此，明晨入內可。洎得覲，則玉音垂詢，皆壁間所懸歷朝聖訓也。以是奏對稱旨。並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而文正自是駸駸嚮用矣。」此外，袁枚在寄呈座師鄧時敏的詩中，更毫不避諱的直言：「父母愛兒子，不能道兒賢。惟師薦弟子，暗中使升天。豈非師恩德，還在父母前。」參見清·徐珂編撰，《清稗類鈔》（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3冊，頁1404。另亦可參見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軼事輯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第3冊，頁1175-1176；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82；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收入叢書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21，〈戊子榜發日作一詩寄戊午座主鄧遜齋先生〉，頁524-525。

³⁸ 參見清·翁心存，張劍輯校，《翁心存詩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上冊，卷9，〈四月五日壬午諸同年陪敦甫師讌集花之寺同年顧杏樓水部即席成詩用東坡陪歐陽公燕西湖韻吾師次韻答之錄以見示余寄迹直廬匪遑離局傾心高會謹疊和二首奉呈〉，頁374-376；同書，上冊，卷9，〈立夏前三日丙子諸同年復陪敦甫師小集龍樹寺余亦未能從遊也再疊前韻奉呈〉，頁376；同書，上冊，卷9，〈敦甫師見和龍樹寺詩四疊前韻仰答並簡諸同年〉，頁377-378；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十一月廿四日、廿八日條，頁115、頁232、頁296-297；同書，第2冊，道光十九年三月廿六日、四月九日、廿八日條，頁710、頁712、頁715。

³⁹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致翁心存函〉，頁43。

贈禮物的名單、金額等，均考慮周詳煞費心思，且略加說明致贈原因。同治四年（1865），翁同爵在信中詳列饋贈名單及金額，因與曹毓瑛（1813-1866）有師生情分，故致贈五十金。其餘各處，包括湯修、湯寬或軍機領班等人，至多亦不可超過三十金。翁同爵解釋云：因此時身任道員，而非封疆大吏，與他們多年世交，倘若家中有事，均能關切照應，故即使典衣餉客亦需為之。⁴⁰翁同爵坦言不惜饋贈金錢之目的，乃著眼於日後可關切照應的實際面。果然兩家交情確實能派上用場，同治四年，翁同爵就任湖南鹽運使前，便曾請湯修打聽湖南中丞的情況，助其了解同僚性情。⁴¹

綜觀翁心存與林則徐、鄧廷楨、湯金釗等家族，多位主戰士人的緊密聯繫，不難理解翁心存在鴉片戰爭前後的政治立場、對外態度，應與主戰陣營較為接近。但倘若仔細檢閱翁心存的日記，又可發現其與滿族官員、當朝大臣互動密切，關係非比尋常。如在京官期間，除座師湯金釗外，翁心存與多位大臣皆保持友好關係，更不時拜會、晤談，包括曹振鏞、穆彰阿、賽尚阿（1794-1875）、英和、王鼎（1768-1842）、潘世恩（1769-1854）等人。⁴²甚或吾人視為與潘世恩、林則徐陣營敵對的穆黨，翁心存皆與之保持密切關係，不似吾人想像兩大陣營士人勢同水火之關係。穆彰阿也曾為翁心存向道光帝爭取應有之恩賞。⁴³穆彰阿本人生日、兒子薩麟中舉、太夫人生日等，翁心存皆特地前往賀喜、祝壽。⁴⁴

⁴⁰ 清·翁同爵著，李紅英輯考，《翁同爵家書繫年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致翁曾翰函24〉，頁239-246。因該書標示分成：「致父母函」、「致翁同龢函」、「致翁曾翰函」等大項，其下再依日期排序、標示為：「1.道光三十年四月初四日（1850-5-15）」、「2.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850-7-4）」等。是故，為利於辨識及讀者檢索，筆者簡化以「致翁曾翰函24」、「致翁同龢函8」等標示方式。以下標示方式均相同，不再另行說明。

⁴¹ 清·翁同爵著，李紅英輯考，《翁同爵家書繫年考》，〈致翁同龢函8〉，頁34。

⁴² 例如：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五年五月四日、閏六月十三日、十七年正月八日到九日、二月三日條，頁139、頁149、頁223、頁230。

⁴³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七年九月十日條，頁282。

⁴⁴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七年九月十日、十二

獲准開缺回籍終養前，特往拜謁英和、王鼎、潘世恩，並與之晤談良久。其後，再謁穆彰阿、文慶（1796-1856）等人。⁴⁵返鄉後，仍可見翁、穆兩人函札往返。⁴⁶咸豐六年（1856），穆彰阿病卒，翁心存更親往祭奠。⁴⁷

除與穆彰阿本人互動外，另一個線索則是與穆彰阿門生的互動，線索一是陳孚恩（1802-1866）。陳孚恩係江西新城人，道光五年（1825）拔貢，授吏部七品京官，後升主事、充軍機章京，累遷太僕寺少卿、大理寺正卿、刑部與工部侍郎，以及刑部、兵部、吏部尚書等要職。陳孚恩任官伊始即深獲穆彰阿信賴，頗受器重，旁人皆目為心腹之一。⁴⁸翁心存不論在京官或居鄉時期，皆與陳孚恩互動密切、魚雁往返。⁴⁹道光卅年（1850），陳孚恩因與怡親王載垣（1816-1861）爭論，遭咸豐帝斥責乖謬，陳孚恩遂以母老乞養為由，返鄉回籍。翁心存特與杜受田、孫瑞珍、朱鳳標（1800-1873）、鈕福保（1805-1854）等人，為其餞別。⁵⁰臨行前，陳孚恩更親向翁心存辭行，數日後，翁心存特撰書柬為其送行。⁵¹線索二則是另一位穆彰阿心腹黃宗漢（1803-1864），道光乙未科進士，該年會試正考官即為穆彰阿。黃宗漢係翁心存擔任福建鄉試正考官時拔擢之門生，緣此師生情誼深厚，從離任送別、新科進士拜謁、

月廿九日、十八年四月廿六日條，頁282、頁303、頁328。

⁴⁵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十二日條，頁331。

⁴⁶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日條，頁417；同書，第2冊，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一日條，頁584。

⁴⁷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3冊，咸豐六年正月廿九日條，頁1092。

⁴⁸ 如《清史稿·王鼎傳》即直書：「軍機章京陳孚恩，穆彰阿黨也。」參見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卷363，〈王鼎傳〉，頁11415。另，有關「穆黨」成員，可參見劉海峰，〈「穆黨」對道光朝晚期吏治的影響〉，頁46-50。

⁴⁹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十一月十日條，頁576、頁590。

⁵⁰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道光三十年六月九日條，頁806。

⁵¹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道光三十年八月一日、八日條，頁817、頁818。

師生聚餐、招飲、觀劇暢敘與拜壽等，翁、黃兩人，甚或眾多翁心存拔擢之門生，皆有密切往來。⁵²真實反映座師門生的誠摯情感。

上述片段，略可看出翁心存與穆彰阿、陳孚恩、黃宗漢等「穆黨」士人，均有一定程度交情。此外，更值得玩味的是，儘管翁心存在鴉片戰爭前後，與主戰士人關係密切，且鴉片戰爭期間，外間已有傳言「若欲平暎夷，須斬穆（彰阿）、伊（里布）、琦（善）」之語；⁵³更有士人評論琦善（1786-1854）「亦欽差大臣也，為查辦夷務，以大學士派赴廣東。怯懦誤事，致使粵民苦遭蹂躪，兵弁因無援被害者無數。……後聞其得黨援力，竟不治罪，且得善職」，⁵⁴而戰敗之責「乃伊（里布）、琦（善）出使，陽奉陰違，轉與夷人交通，喪師辱國。論者斥為滿奸，罪更浮於漢民附惡者矣」。⁵⁵即便時談物議如此，但翁同書卻始終對琦善讚譽有加。咸豐三年，翁同書因效力揚州江北大營琦善軍中，故與琦善相熟，在多封與父親的信函中，毫不掩飾地讚揚琦善，舉凡帶兵能力、彪炳戰功與個人操守等皆有論及，且字裡行間再三流露為琦善打抱不平之感。⁵⁶雖未見翁心存回應，但倘若翁心存對此評

⁵²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五年十月一日、十五年五月七日、閏六月廿六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七年正月九日、二月十二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十一日、五月十四日、九月廿六日、十八年二月二日到三日、五月六日到七日條，頁44、頁140、頁151、頁186、頁223、頁232、頁239、頁245、頁254、頁286、頁309、頁310、頁334-335。

⁵³ 清·趙鈞撰，溫州市圖書館編，陳偉玲整理，《趙鈞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上冊，頁234、頁254。因《趙鈞日記》據作者自述係以札記而成，與一般習見之日記形態，清楚按日條列記述不甚相同。部分內容甚至並未註明書寫日期，或係日後補記而成，為免判讀錯誤，故未寫明日期，僅標示頁數。以下標示方式均相同，不再另行說明。

⁵⁴ 清·趙鈞撰，溫州市圖書館編，陳偉玲整理，《趙鈞日記》，上冊，頁236。

⁵⁵ 清·趙鈞撰，溫州市圖書館編，陳偉玲整理，《趙鈞日記》，上冊，頁240。

⁵⁶ 翁同書直言「今之良將何在？琦帥第一能用兵者，無如眾人百口訾之」、「清廉公正之帥，只見琦侯一人，世以其驕慢、猜忌、刻核而并掩其長，豈公論哉」、「自軍興以來，各處奏報多非事實。有時恐獨云，賊至數萬；有時鋪張云，俘斬數千。……僅一琦故帥不妄奏，而賢人君子群指詈之千古，真是非何從論乎」、「琦相住極小賬房，雨淋日炙，都中蜚語，謂居園齋，可謂千古奇冤。……琦相

論略有微詞，其子應不至於在家書中無所顧忌接連為其平反。綜觀上述，足見翁心存父子與整個廣義的「穆黨」士人均維持密切聯繫，且未如輿論般一面倒地猛烈抨擊鴉片戰爭期間主和陣營士人，顯見道光朝局士人立場委實錯綜複雜，絕非涇渭分明而能輕易截然劃分。因為除了在光譜兩端的黑與白之外，還有著無限顏色分布其中，是故吾人仍有必要更加細緻區分，方能獲致實情。

此外，翁心存自道光九年（1829）起，先後受命擔任惠郡王綿愉、咸豐帝與恭親王奕訢的師傅，故與天潢貴胄保持緊密聯繫。其中，尤與綿愉關係最為緊密，不時可見翁心存與之宴遊、聚談，且獲贈食物、楹帖、詩文集、駿馬、物品等，並回贈橫披、扇子等。⁵⁷翁心存獲准乞養回鄉後，綿愉親自設宴餞別、贈送翁母人蔘二兩、賦詩送別、金錢、食物、藥錠、扇對等。⁵⁸返鄉後，仍與綿愉保持聯繫，不時魚雁往返。⁵⁹凡此種種，略可見翁心存在道光朝不僅能在漢人士人集團具有一定發言權與交遊網絡，亦可站穩穆黨

夏絺葛，冬羊裘，或笠而騎，未有一鮮衣，雷、慧皆華服珍裘，無議之者」。參見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致翁心存函〉，頁75、頁91、頁99、頁160-161。

⁵⁷ 翁心存記兩人互動，例如：「申刻回寓，惠邸送菜來，即以供晚飯」、「惠邸以楹帖及食物來饋」、「謁惠邸，譚良久」、「惠邸以公事入城，便道見過，譚良久乃去」、「謁惠邸，暢譚良久，時已下春」、「惠邸招余及同直諸君游鳴鶴園，本儀邸舊園，今年春新承恩賜者也。……惠邸留余等飯，飯後引余等遍游亭台，步步引人入勝，歸已曠黑矣」。參見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廿五日、十五年閏六月十二日、十八日、十七年正月八日、十月廿八日、十八年四月廿日條，頁115、頁117、頁149、頁150、頁223、頁291、頁327；同書，第2冊，道光三十年二月四日條，頁780。

⁵⁸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十六日、五月一日條，頁332、頁334。

⁵⁹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三日、二十日、六月八日、十二月六日條，頁344、頁345-346、頁376、頁417；同書，第2冊，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五月廿八日、六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日、廿六日、十二月廿五日、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六月十三日、十月廿八日、二十五年九月廿日、十月一日、十二月廿一日、二十六年正月十六日、三月八日、五月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八年三月六日條，頁448、頁456、頁458、頁478、頁481、頁496、頁508、頁531、頁562、頁582、頁584、頁596、頁601-602、頁611、頁621、頁622、頁643。

陣營或滿人勢力中，進而對政局發揮主導力量。

三、翁心存的居鄉生活（1838-1849）

早在道光十五年（1835），翁心存即曾於召見奏對之際，「具陳母老抱病情形，籲懇歸養」，然道光帝答以「俟汝母八旬，再行陳情」。⁶⁰十八年，翁心存謂「慈親年已八十，精力漸衰，反哺之心日切一日，自維受恩深重，不敢告勞，顧忠孝不能兩全，進退之義籌之已熟矣，決計陳情，不可再緩」，⁶¹終獲特旨俞允。陛辭當天，道光帝仍再三慰留。啟程時，自惠郡王綿愉以下大小官員盡皆賦詩送行，同年 30 餘人更在「文昌館」設席餞別、題詩相贈，由梅曾亮作序紀念。⁶²歷經一個月左右的路程，返鄉後的翁心存，居家奉母讀書，主講游文、紫陽書院，期間舉薦人才不可勝數。⁶³以下將進一步以鴉片戰爭情報傳遞和地方事務的觀察、討論為例，論析翁心存居鄉期間活動，及其發揮的影響力。

（一）翁心存與管庭芬的戰爭訊息比較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在清朝歷史中具有關鍵意義，但位在戰爭前線東南沿海一帶的士人是如何接收戰爭訊息、掌握戰爭動態？此時居住在江蘇常熟的翁心存，其日記提供了觀察線索。同時，另一位居住在浙江海寧的諸生管庭芬（1797-1880）亦留下了日記，翁、管兩人的日記遂可對照討論。緣此，以下將分析兩人日記中對於道光廿年六月八日鴉片戰爭爆發後定海失陷的相關記述。

⁶⁰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條，頁186。

⁶¹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九日條，頁330。

⁶² 清·翁心存著，張劍輯校，《翁心存詩文集》，下冊，附錄一，〈先文端公年譜〉，頁1367；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廿三日到廿七日，頁333；清·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枧山房詩文集》，卷3，〈送翁二銘序〉，頁60-61。

⁶³ 清·翁心存著，張劍輯校，《翁心存詩文集》，下冊，附錄一，〈先文端公行述〉，頁1352-1358。

管庭芬，浙江海寧路仲人，曾參加科考多次，卻始終未能中式，僅獲諸生頭銜。海寧地區和定海僅一箭之遙，與翁心存居住之江蘇常熟相比，更近於定海。六月八日定海之役爆發後，究其日記所載，六月十三日，管庭芬即駭聞英夷進犯浙江、定海失守，且知縣姚懷祥（1783-1840）、典史全福皆捐軀殞首。廿五日，再獲消息，得知英夷攻取乍浦，為官兵擊退。七月廿七日，復聞英夷進攻廈門，遭官兵力拒而退，仍踞守定海。八月廿一日，獲悉英夷杉板小船游奕海面。九月四日，聽聞英夷小船擱淺，遭鄉勇誘入捕獲黑、白夷 12 人。是故，自六月八日爆發定海之役後，四個月內，管庭芬日記中僅有五則訊息提及英夷進犯之事。其餘內容，仍舊以親友聚談、校閱書籍、科考議題等為主。雖然在六月廿六日述及「時沿海大家作趨避計者紛紛，吁可嘆焉」，但仍未明顯感受緊張、驚恐的氛圍。⁶⁴儘管如此，雖無法斷言管庭芬並未接收更多戰爭相關情報，然假若管庭芬接收了更多戰爭訊息，卻未寫入日記之中，或許亦反映出另一種對戰爭的態度。

相較於此，翁心存日記中呈顯出截然不同的戰爭氛圍。儘管所居之常熟距定海較海寧更遠，但翁心存早在六月十四日即已接獲定海之役的相關訊息，唯翁心存杜門不與官府接洽，故無從探知實情。十五日，翁心存風聞浙江有夷船駛至，定海被圍之事。十六日，接獲友人來信，確知定海已於八日淪陷。其後，直至道光廿一年（1841）年底，翁心存在日記中幾乎天天均有夷務相關訊息，或風聞各類訛警，或與鄉紳、知縣會商相關事務的記述，隨著後續戰事演變，亦持續接獲相關情報。⁶⁵

戰爭消息傳至常熟後，各級官員和鄉紳莫不爭相拜會翁心存，向其請益、商討相關政務。翁心存對地方事務的主導力量也逐漸發揮。姑舉一例為證，六月十九日，常熟、昭文二縣知縣一同拜訪翁心存，商討籌辦團練鄉勇之事。然翁心存期期以為不

⁶⁴ 清·管庭芬撰，張廷銀整理，《管庭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第3冊，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到九月初四日條，頁1002-1011。

⁶⁵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到除夕條，頁378-421；同書，第2冊，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元旦到除夕條，頁423-496。

可，因眼下撫恤、賑濟方為當務之急，倘若賑災、練餉同時進行，恐無法負荷。且倉促召募多為市井游手或不逞之徒，亦無濟於事。翌日清晨，縣丞、知州、知府等官員，往拜翁心存，表達籌練鄉勇的困難之處，應請縣府增派士兵戍守。翁心存遂與之一同前往拜會知縣，表達意見。常熟縣知縣只能應允，眾人改議賑濟之事。廿二日，遂有士紳前來與翁心存商議勸捐賑災告示。廿三日，昭文縣知縣卻以欽差大臣伊里布（1772-1843）要求辦理團練鄉勇之諭送閱翁心存。廿四日，兩邑知縣再次同訪翁心存，以伊里布要求辦理團練為由，不得不推行。翁心存仍維持一貫態度，「議團、議賑斷難兼行」。當晚，翁心存旋即飛棹入省，拜謁兩江總督裕謙（1793-1841）以及江蘇布政使邵甲名（1789-1841），但因時間已晚，無法見面。待隔日，先是謁見裕謙，闡明來意，獲裕謙支持，「團練不足恃，今日之事，自宜以賑災為第一要務」。其後拜會邵甲名，亦得支持。廿六日，返家後，先與昭文縣知縣晤談，翌日，再與常熟縣知縣長談。廿八日，士紳 40 餘人齊集，兩邑知縣出示捐簿勸捐，然眾人恐遭移作軍需之用，觀望欲避。最後，在翁心存向常熟縣知縣說明後，知縣在捐簿上書寫「專為賑濟事」，士紳方始認捐。七月八日，另有一插曲，忽有一常熟縣吏員持縣札來諭團練鄉勇之事。翁心存遂謂「此局專為勸捐賑濟，斷難兼顧練勇事，不受其札，仍令該吏持去」。⁶⁶由此可知，翁心存有其堅定立場，並運用身分、網絡四處斡旋，確保政策推行。儘管論者認為：以翁心存為首的地方士紳對捐款賑濟一事推諉迴避，凸顯官紳、紳民的關係皆轉趨緊張。⁶⁷然揆諸翁心存為先賢名士撰述的行狀，即可發現其高度讚揚捐輸賑濟一事，同時在與友人信函中更明確表達團練危害地方治安的憂心，⁶⁸此與日後翁氏家

⁶⁶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九日到廿八日、七月八日到九日條，頁379-383、頁385-386。

⁶⁷ 羅曉翔，〈晚清江南社會的紳權與信任危機：以常熟為中心〉，頁51-60。

⁶⁸ 參見清·翁心存，《翁心存詩文集》，下冊，卷30，〈與陸立夫中丞書丁未十一月〉，頁978-979；同書，下冊，卷30，〈復桂星垣太守書〉，頁983-986；同書，下冊，卷33，〈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龐公墓志銘〉，頁1024-1026；同書，下

族對湘軍的負面評述不無關連。⁶⁹由此略可窺知翁心存對地方事務的鮮明態度。

戰事爆發後，翁心存每日生活重心皆與此相關，且官府、士紳隨時因應，試圖將百姓們恐懼不安的心情減至最低，嘗試避免受到夷匪騷亂的影響，故文字中不時透露出惶恐不安的憂心，以及面對未來的強烈不確定感、無力感。儘管日記中翁心存力陳面對各項訛傳亦莫衷一是，難辨真偽，但仍可見翁心存接獲各方師友來信，向其通風報信。同時，翁心存亦致函給多位師友，內容必然涉及當地夷務戰情。此外，翁心存更直接與林則徐魚雁往返，故可獲知最新消息，且較易於閱讀邸鈔。管庭芬僅能從友人處讀到林則徐奏稿，更少有機會能翻閱邸鈔，⁷⁰自然在相關訊息取得上，遠遠落後翁心存。相較於管庭芬在四個月內，日記中僅有五則訊息提及此事，依舊著重記述友朋聚談、科考事宜的情況，說明兩人不論是對夷務的關注程度，或情報資訊的取得，均有極大差距。

造成如此大之差別的原因之一，或許就在兩人的身分差距，而這個差距便是來自科舉成功與否。因管庭芬僅獲諸生頭銜，缺少科舉人脈網絡，在其日記中，明顯可見交友範圍侷限於親緣和地緣之內，文字記錄多為親身經歷或鄉里見聞，故其網絡只在一省之內，難以向外開展，以致情報訊息的取得管道亦受限制。反觀翁心存代表取得最高功名且供職於中央的高級官員，因此不論在京或居鄉均有龐大的網絡系統提供情報資訊。同時，他也成為情報網中的重要一環，發送各式訊息給網絡中的其他士人。但值得措意的是，《翁心存日記》中明顯可見鴉片戰爭期間各地寇匪警報、勝敗消息等盡皆莫衷一是，致使人心惶惶。即便身處戰區附

冊，卷33，〈曾石谿墓志銘〉，頁1029-1031；同書，下冊，卷33，〈錢文伯墓志銘〉，頁1036-1038。

⁶⁹ 相關評述，參見清·翁同龢著，李紅英輯考，《翁同龢家書繫年考》，〈致翁同龢函30〉，頁83；同書，〈致翁曾翰函42〉，頁291-292。

⁷⁰ 清·管庭芬撰，張廷銀整理，《管庭芬日記》，第3冊，道光十九年四月廿六日條，頁955。

近也未能精準掌握戰局變化，翁心存對此深有感觸。儘管翁心存積極藉由與師友、家人的魚雁往返瞭解最新戰情，且親友亦謂其必知確信，故訪客絡繹不絕，急欲探詢消息真偽，但仍不時發現假消息流竄，混淆視聽，連翁心存對此亦無所適從，只能再三修正相關訊息。⁷¹另一位浙江瑞安的庠生趙鈞（1786-1866），亦有相關記錄：「自八月下旬，因夷匪在寧滋擾，聞報後訛言紛紛，一時一樣，一人一番，無識者多為所搖，郡城、縣城遷避者絡繹不絕。」⁷²由此可知，極度紊亂的戰爭訊息在當時是一個重大問題，困擾著士人與庶民，更造成社會恐慌。

（二）地方事務的觀察與政事議論

即便翁心存遠離權力核心，居鄉奉養母親，但其網絡聯繫未嘗中斷，且在地方上仍具高度影響力。翁心存雖不必像趙鈞一樣，汲汲營營於生活，但所關切的事務亦大同小異。⁷³正如論者所言，地方精英權力的興起乃嘉慶朝新現象，⁷⁴是故，觀察翁心存居

⁷¹ 參見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二十年六月廿三日條，頁381；同書，第2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九月二十日、除夕、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到十四條，頁471、頁480、頁496、頁520。

⁷² 清·趙鈞撰，溫州市圖書館編，陳偉玲整理，《趙鈞日記》，上冊，頁256。

⁷³ 在趙鈞的日記中隨處可見其生活用度的記載，且略帶捉襟見肘之感。如「自辛未嘉慶十六年與兄分爨後，至丙戌歲，中間計十六年，通盤計算，一年約用錢五十千文」；「余生平時以『讀書養性、節欲儉用』八字自省。此八字真是保身保家秘訣，可以用之不盡。……書『貧不可不耐，用不可不節』數語，粘之臥室，以自省記」；「值貧賤時，莫只管怕人笑。怕人笑，便生煩惱。此中有命，我不能禁人笑，人亦笑我不得」；「世人御貧，不究致貧之原，百計強求，無益也。清其源，節其流，生財之道也」；「余家本貧薄，只是節用，故貧而不窘」；「近來因米貴啜粥不飽，又衣物無處質錢，時典鋪皆閉。愁慮無聊，自覺神情憔悴」；「計家用，七月至十月四個月，約計必需錢七千，不知何處挪措，計時不覺心煩」。參見清·趙鈞撰，溫州市圖書館編，陳偉玲整理，《趙鈞日記》，上冊，頁61、頁76、頁80、頁81、頁86、頁97、頁133。

⁷⁴ 參見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許存健譯，《言利：包世臣與19世紀的改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210；Seunghyun Han, *After the Prosperous Age: State and Elite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uzhou*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巫仁恕，〈官與民之間——清代的基層社會與國家控制〉，收入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頁423-474。

鄉時期對地方事務與全國政事之評述，或有助於吾人對嘉慶朝地方精英權力興起的新現象，以及翁心存個人政治立場、網絡連結進行更細緻的討論。

誠如上述，翁心存的網絡聯繫在居鄉養母期間仍持續運作，並不斷鞏固、拓展，透過與在京或赴任各地的師友魚雁往返，討論地方事務或朝野重要政事。其中，密切聯繫者有祁寯藻、李星沅（1797-1851）與陸建瀛（1792-1853）等人。祁寯藻係嘉慶十九年（1814）進士，散館後即派任為京官，深獲器重。推測翁心存自任職京官伊始，即與祁寯藻相識，且自道光九年入直上書房後，兩人便始終維持密切聯繫。返鄉後，更不時可見書信往返，如道光廿五年（1845），祁寯藻特別致函翁心存詢問當前政務，內容涉及政務改革與各式弊病，翁心存先是表明「方今聖明御寓，德澤遐敷，海甸銷兵，河流順軌，中外額手，共慶太平」，然話鋒一轉論及今日之弊，並同意祁寯藻反對變法的看法，因「今日之弊，非法弊也，實不能行法之弊」。此外，亦論及漕運、鹽務弊病，應立即整飭。⁷⁵

道光廿六年（1846）一月至三月，翁心存連續三封書函與江蘇巡撫李星沅，針對江南蘇州府、松江府等地之漕務積弊進行意見交換。翁心存在信中開宗明義表示「蘇松漕務殷繁，敝鄉尤甚。科斂日重，情偽日滋，錮蔽愈深，官民交困」，期望李星沅能振刷、肅清數十年積弊。此外，翁心存亦反覆說明家鄉情況，並提出具體改革之策，如官吏得人、覈實公費、拔除奸胥、預防蠹棍勾結、革除幫費、浮費等。⁷⁶但李星沅卻在日記中，評述翁心存之建議雖為「正論」，然「事多扞格難行」。⁷⁷其後，在道光廿七

⁷⁵ 清·翁心存著，張劍輯校，《翁心存詩文集》，下冊，卷30，〈答祁淳甫大司農書〉，頁967-968。

⁷⁶ 清·翁心存著，張劍輯校，《翁心存詩文集》，下冊，卷30，〈答李石梧中丞書〉，頁969-970；同書，下冊，卷30，〈復石梧中丞第二書〉，頁970-972；同書，下冊，卷30，〈復石梧中丞第三書〉，頁972-973。

⁷⁷ 清·李星沅撰，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下冊，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廿日條，頁646、頁647。

(1847)至廿八年，又與接替李星沅職務之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陸建瀛，持續討論政務。而陸建瀛係翁心存同年，兩人關係更為緊密。信函中，翁心存再次表達其一貫理念，即「國家立法，本極周詳。法敝無庸變法也，得人則法自可行」，且未能操之過急。⁷⁸

透過相關記述，即可發現翁心存居鄉期間不僅關注鄉里積弊，仍心繫全國事務，持續與中央師友討論各項議題，冀期由上而下革除弊病，然而所提意見卻未必可行。此外，翁心存立論仍偏向傳統思維，所論改革法仍不離訴求人心、人治的套路，對於變法革新依舊難以接受。⁷⁹又，從翁心存與當地官員的討論中，亦可見常熟地區鹽、漕、河等諸多弊病始終未能大幅改善。這些翁心存居鄉期間的見聞、感受，是否影響到他第二回京官時間，接掌戶部之後的若干政策？或有待另文討論。

四、日常生活的關懷重心與活動

世家大族的興起與科考成功與否關係密切，⁸⁰翁心存自然深知此理，故對族人門生的科考情況，十分關心。由翁氏父子的文字切入，可一窺其內心情緒起伏，並探索整體社會氛圍。其次，士人訪書閱讀乃天經地義，但身處嘉道變局，士人如何承續傳統思

⁷⁸ 清·翁心存著，張劍輯校，《翁心存詩文集》，下冊，卷30，〈復陸立夫中丞書〉，頁974-977；同書，下冊，卷30，〈致立夫中丞書〉，頁977-978；同書，下冊，卷30，〈與陸立夫中丞書〉，頁978-979；同書，下冊，卷30，〈與立夫中丞書〉，頁980-981。

⁷⁹ 翁心存在〈書《貞觀政要》於屏風論〉一文中，對變法革新的議題有更明確表述。參見清·翁心存著，張劍輯校，《翁心存詩文集》，下冊，卷22，〈書《貞觀政要》於屏風論〉，頁816-818。

⁸⁰ 如黃寬重教授已有多篇論文闡述宋代家族之興衰與科舉成敗的密切關係。亦有研究者關注明清時代嘉興地區108家家族，其興衰與聯姻、科舉之間錯綜複雜的關連，或以清代濟寧孫氏家族為例進行說明介紹。參見黃寬重，〈科舉、經濟與家族興替：以宋代德興張氏家族為例〉，收入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秘書處編，《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96），頁127-146；黃寬重，〈科舉社會下家族的發展與轉變——以宋代為中心的觀察〉，《唐研究》，11（北京，2005.12），頁337-353；丁輝、陳心蓉，《明清嘉興科舉家族姻親譜系整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王洪軍，《清代濟寧孫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想資源？應對西學東漸之勢？翁心存適值時代轉變的分歧點，透過解析翁氏父子對傳統書籍與新知的態度，或可作為觀察士人與世變的重要線索。

（一）關心族人、門生科考情形

誠如上述，由科舉同年、座主門生等建構而成的士人網絡至關重要，因此翁心存自然對族人、門生的科舉成績無比重視。

在《翁心存日記》中，不時可見其密切關注諸子、家族後輩，甚或弟子門生的科考情形。翁心存在返鄉奉養老母期間，親自教導翁同爵、翁同龢二兄弟課業，而對諸子中舉與否，更時常縈懷於心、寄予厚望。道光十五年，獲悉翁同爵得入縣學校，喜出望外。⁸¹道光廿年四月七日，翁心存得長子翁同書家信，詳細稟明今年會試情形、試題內容等。十一日，猜想會試已然放榜，未知長子獲雋否。十三日，更得友人手書，云占卜知翁同書必中，更讓翁心存忐忑不安。十五日，終於接到翁同書中舉捷報，喜不自勝。隨即焚香告祖，叩謝天恩，頃刻之間親友登門道賀。翌日，更是「賀客絡繹，竟日不絕」。此後，接連數日皆有賀客來訪，好不熱鬧。⁸²以上可知家族內至親好友與地方上各級官員對科舉的態度，以及中舉背後代表的深刻意涵。至少在經濟上，能讓新科進士有一筆可觀收入。如曾國藩（1811-1872）考中進士後，經由五回拜客，獲得來自親朋好友、鄉族宗祠、商家店舖與地方官員等，多達1,495.17兩的收入，讓原本家境貧困的曾國藩有足夠旅費北上翰林院供職。⁸³道光廿八年，翁同龢考取拔貢生，再次讓翁心存感到欣幸之至，連日皆有賀客登門，若非翁心存母親過世，場面應更盛大。咸豐六年，翁同龢殿試時，翁心存甚為掛心，獲

⁸¹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五年三月廿五日條，頁132。

⁸²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二十年四月七日到廿四日條，頁361-364。

⁸³ 參見張宏傑，《給曾國藩算算賬：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京官時期）》（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13-36。

悉高中狀元時，更是天大喜訊。⁸⁴翁同書、翁同爵皆致函恭賀其父，表達舉家歡慶之情。⁸⁵唯時值翁心存老師兼親家湯金釗過世，沖淡了翁同龢高中狀元的欣喜之情。

翁心存亦特別注意門生中舉情形，一旦中舉或高中會元，更為之「狂喜」。⁸⁶門生陸續獲雋、謀得官職，無形中大幅提升翁心存與翁氏家族的影響力。同時，翁心存也留意大員子弟的情況，如道光廿年王鼎之子王沆和卓秉恬（1782-1855）之子卓樞（?-1857），皆為翁同書年友。⁸⁷這些日記中留下的記載，反映了翁心存對科舉的高度關注。這種關注也呈現在其對科舉舞弊的深惡痛絕。道光六年（1826）翁心存出任廣東學政之際，拔擢楊懋建（1806-1872）並給予極高評價。然十七年，楊懋建因受龍士瀛雇請，頂替張文濟代考，遭逮入獄，審訊後革除舉人資格，發往邊地充軍。翁心存在日記特別記述此事：「初尚未深信，今日問陳生，乃知其詳，有文無行，孤負惺庵與余二人栽培，殊為可恨。」⁸⁸

除翁心存外，翁同爵、翁同龢在家書中亦顯露出對於兄弟子姪參與科考的熱切關注。其中，翁同爵僅於咸豐元年（1851）考取廕生一等第二名，翌年（1852）應順天鄉試不第，遂絕意舉業，為三兄弟中唯一未中進士者，故對科舉特別在意。家書中，不時可見翁同爵除了勸導子姪們勤學向上、早日高中科舉，亦表示將提供子姪們讀書、應考經費，全力支持翁同龢京寓用度，多次致信翁曾翰告知將全力支應相關開銷，不必過度撙節。同治四年三

⁸⁴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到十八日條，頁673-674；同書，第3冊，咸豐六年四月廿一日到廿五日條，頁1117-1118。

⁸⁵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致翁心存函〉，頁74-77；清·翁同爵著，李紅英輯考，《翁同爵家書繫年考》，〈致父母函5〉，頁10。

⁸⁶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二十年四月十六日條，頁363；同書，第2冊，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十六、十七日、三十年四月十日條，頁443、頁793；同書，第3冊，咸豐六年四月十日條，頁1113。

⁸⁷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二十年四月十六日條，頁363。

⁸⁸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條，頁284。

月，再三叮囑兒輩應試所需注意事項，且預先安排考後續留或返鄉事宜，不必吝惜旅費。四月起，接連數封致翁同龢信函中，皆問起是否有兒輩中舉消息，甚為掛心，坦言儘管工夫淺薄、希望渺茫，但仍抱有中舉妄想。直至六月獲悉兒輩無人中舉，便歸諸於命也。⁸⁹翁同龢也有類似的表現。同治二年（1863），翁同龢之子翁曾源（1834-1887）得祖蔭，免予參加會試，逕至殿試。殿試當天翁同龢久候翁曾源未出，焦急萬分。翌日，翁同龢旋即拜訪好友孫念祖（1829-?）、張丙炎（1826-1905）打探消息，知翁曾源「寫作甚好，可望前列」，稍安心。二天後小傳臚，翁同龢得翁曾源高中狀元喜訊，「悲喜交集，涕淚滿衣」，隨即焚香敬告先靈，叩賀慈親。一時之間賀客雲集，好不熱鬧。翌日，翁同龢設宴於常昭會館，邀請同鄉、府尹、府丞等好友一同慶賀。五月五日，翁同龢更備齊牲禮，敬告祖先翁曾源得大魁之事，且在翁心存牌位前痛哭不已。⁹⁰翁氏父子的重視，略可說明科考功名對於士人、家族的重要意義。

此外，翁心存為傳承自身科考經驗，嘗刊印《考卷雋快》，評點科考試卷內容。這類書籍成為投身舉業士人的重要參考書，浙江瑞安庠生趙鈞便有相關閱讀記錄。⁹¹值得一提的是每當科舉考罷，旋即有人兜售中榜名單，但真實性往往遭到質疑，且名單並不完整，或係有誤。而這並非單一個案，在《翁心存日記》的記錄中，至少出現二次以上，顯見有心人士利用民眾急欲得知榜單消息的心態，兜售各式真偽莫辨的名單，藉以賺錢謀利。⁹²咸豐六

⁸⁹ 清·翁同龢著，李紅英輯考，《翁同龢家書繫年考》，〈致翁同龢函8〉，頁32-35；同書，〈致翁同龢函12〉，頁40-43；同書，〈致翁同龢函13〉，頁43-47；同書，〈致翁同龢函14〉，頁47-48；同書，〈致翁同龢函15〉，頁48-50；同書，〈致翁同龢函17〉，頁51-53；同書，〈致翁同龢函19〉，頁56-57。

⁹⁰ 清·翁同龢著，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1冊，同治二年四月廿一日到廿五日、五月初五日條，頁271-273、頁274。

⁹¹ 清·趙鈞撰，溫州市圖書館編，陳偉玲整理，《趙鈞日記》，下冊，頁455。

⁹²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二十年五月三日條，頁366；同書，第2冊，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七日、三十年四月九日條，頁454、頁793。

年，在翁同書致翁同龢函中，亦提及出現兩份不盡相同的中舉名單，直到接獲家書，始確知翁同龢中舉。⁹³這類四處流竄、難辨真假的科舉名單，如同上述戰爭訊息一樣，對士人群體，乃至社會皆產生不小問題。

（二）「願向鄉環福地住，盡發寶笈瑤編看」⁹⁴

道光之際正是士人思想資源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時刻，除了傳統諸子百家思想外，域外新知逐漸受到士人關注。然獲得傳統功名的士人如何蒐羅舊學、汲取域外新知？翁氏父子的日記、書信等，或許可供按圖索驥。

1. 蒐羅珍稀書籍

傳統學問自然是翁心存關注核心。翁心存從小喜好聚書，雖家貧，猶縮衣節食，積錢購買，「甚而標歲穀以易之」，若遇卷帙浩繁、價格昂貴無力購買，即發動全家人抄寫、裝訂成冊。⁹⁵其後，同鄉好友陳揆（1780-1825）病逝，十多萬冊藏書四散，翁心存以原價收購其中四、五萬冊，包括宋元刻本、明清名賢手稿、經史、金石文字、鐘鼎篆籀等。⁹⁶

翁心存諸子自幼即耳濡目染，成年後亦四處訪求各式書畫，如道光廿四年（1844）十一月，翁同書在寄給父親的信函中，提及：「前日在琉璃廠買得明洪武三十一年海虞朱燧（住十三都潭涇上）手鈔元人賦三巨冊，名曰《至治之音》。」隔日，在給翁同龢的信中，亦特別說明：「新購明初邑人朱燧手錄元人賦冊，蠅頭草書，書不佳而存此舊書，則足寶也。」⁹⁷道光廿五年一月，翁同書

⁹³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致翁同龢函〉，頁157。

⁹⁴ 清·翁心存著，張劍輯校，《翁心存詩文集》，上冊，卷2，〈書估行 購求異書也〉，頁65。

⁹⁵ 仲偉行，〈常熟翁氏藏書源流考〉，《文獻》，2003：1（北京，2003.1），頁207-208。

⁹⁶ 清·潘祖蔭，〈稽瑞樓書目序〉，收入清·陳揆編，《稽瑞樓書目》（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1。

⁹⁷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致翁心存函〉，頁13；同書，〈致翁同龢函〉，頁124。

致翁同爵信中，透露「近來廠肆所鬻書畫鮮佳品，僅見一字卷合裝，何義門及迂伯公行書各一，數以價昂未買。又見《詒晉齋臨九成宮》全冊，絕妙，尚擬以厚直購之。碑版出土者日多，但少佳者」。⁹⁸二月，另一封信中，又談到：「廠肆有董思翁詩及尺牘合裝冊，索價過昂。成邸臨《醴泉銘》極妙，酬直八金猶不肯售。姜西溟字，殘冊，小行楷，極精，擬以三兩購歸。」⁹⁹此外，翁同書也會向父親報告新得之書畫與購入金額，且特別強調皆係真跡而非贗品，包括：「王耕烟臨李伯時《龍眠山莊圖》，十金。……明尚寶少卿《陸公師道手鈔畫鑒》一冊，二金。《詒晉齋臨醴泉銘冊》十金。……董文敏四詩七札合裝冊，價太昂。」¹⁰⁰在如此用心蒐羅下，藏書日漸豐富。咸豐七年（1857），翁同書將兩大箱書籍寄回家中，為免丟失，特在致翁同爵函中附上書目，且詳細說明寄贈給父親、兄弟、子侄的書名。¹⁰¹

除親往書肆或因赴任各地四處訪求珍稀書籍外，亦有不少書賈直接上門兜售各式書籍。如道光廿年三月，趙姓書商以許易《惕關詩鈔》、薩熙《古文稿》鈔本、吳大經《叢桂軒詩》印本、《金石小箋》等書來售，「俱可買，而索值太昂，還之」；¹⁰²道光廿五年十二月，湖州趙姓書商來訪，翁心存購得「閩本《易經》、明南監板初印《隋書》、明修元板《新唐書》、鈔本《酌中志》、《明詩綜》、《帶經堂集》、《重刻玉海》」，此外，另有李兆洛（1769-1841）家藏本之舊鈔本《野獲編》、宋人龍衮《江南野史》、《鑒誠錄》、《庶齋老學叢談》、陸輔之《吳中舊事》、盛時泰（1529-1578）《玄牘紀》、《嚴分宜清玩籍》等書。其中《江南野史》、《鑒誠錄》、《庶齋老學叢談》與《嚴分宜清玩籍》，因索價太

⁹⁸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致翁同爵函〉，頁127。

⁹⁹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致翁同爵函〉，頁129。

¹⁰⁰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致翁心存函〉，頁28。

¹⁰¹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致翁同爵函〉，頁148-150。

¹⁰²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道光二十年二月六日條，頁348。

昂，遂還之。¹⁰³

在與書商交易過程中，昂貴書價始終是個大問題，時人沈銘彝（1763-1837）在日記中便提及道光十五年「《昭代叢書》已為沈姓大有力者刻竣，但每部要賣十洋，寒士不可得也，可嘆！」¹⁰⁴由此可見，書價騰貴或許是另一個困擾士人的棘手問題，就連翁氏父子亦屢屢抱怨，甚難負擔。

2. 吸收域外新知

域外新知的傳入，當以鴉片戰爭前後愈漸頻繁。翁心存日記中，首度提及閱讀涉外相關事務之書籍，即道光廿一年，楊炳南的《海錄》，日記中更摘錄英國之地理位置、人口、國情狀況等，並慨嘆廣東官員不知訶察、預防。二天後，再從友人處借閱《籌海圖編》一書。¹⁰⁵一個月後，文俊（1799-?）的幕僚，藏書家楊文蓀（1782-1853）來訪未遇，贈翁心存《海錄》一冊。¹⁰⁶

《海錄》係由謝清高（1765-1821）口述，楊炳南筆記而成。謝清高早歲曾受雇於番船，十四年間遍歷海外諸國，並習其語言。其後流寓澳門，以通譯為生。道光廿年，楊炳南往遊澳門，與之相遇，兩人綜論海外事，因與國內所言多不合，遂成《海錄》一書。該書內容涉及英、法、普魯士、奧地利帝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美國等，論者謂「雖因其知識之限制，內容簡略，不得要領」，但仍是嘉道時期，最早海外實地見聞之作。¹⁰⁷《籌海

¹⁰³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條，頁591。

¹⁰⁴ 轉引自：王健，〈居鄉之苦：《沈竹岑日記》所見「道光蕭條」與江南鄉村社會〉，《江海學刊》，2013：6（南京，2013.11），頁159。因筆者所見之《沈竹岑日記手稿》係《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版本，該書係以行草手稿印行，字跡潦草，辨識極為困難。因時間有限且內容龐雜，尚未辨識、閱讀至所引之處。故權宜之計，暫時轉引王健之文所載內容。

¹⁰⁵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六日條，頁424。

¹⁰⁶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廿六日條，頁428。

¹⁰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第2分冊，頁754。有關《海錄》作

圖編》則是明人鄭若曾（1503-1570）的著作，結合圖文，詳細描繪沿海地理形勢、島礁分布及其軍事意義、日本基本情況、中日交往歷史、倭寇入侵途徑、時人抗倭、禦寇言論，以及明代海防建制、武器裝備和抗倭經歷等。¹⁰⁸

道光廿一年三月，李紹昉（1787-1845）來訪，出示《海防全圖》，翁心存細閱後，指出《海國聞見錄》乃其粉本。¹⁰⁹道光廿六年，與翁心存交好的錢廷錦，向翁心存出示《舟車所至》一書，內容包括：吳振臣《寧古塔紀略》、錢良擇（1645-?）《出塞紀略》、顧彩（1650-1718）《容美紀游》、陳倫炯（?-1747）《海國見聞錄》、王大海《海島逸志》、楊炳南《海錄》等。¹¹⁰

道光廿九年，祁寯藻致贈翁心存徐繼畲（1795-1873）撰述之《瀛環志略》，翁心存特別將《瀛環志略》之內容與謝清高《海錄》、魏源《海國圖志》相比較，讚許《瀛環志略》較為詳細，但仍認為「譚天測海，荒誕難稽，予終疑泰西人之狡獪耳」。¹¹¹由此可知，翁心存對《瀛環志略》、《海錄》、《海國圖志》皆有閱讀，即便日記中未見提及閱讀魏源《海國圖志》一事。進而，翁心存對於諸書所述西洋事情並未全然信服。

然早在道光廿四年十一月，翁同書寄給翁心存函札中，便載明寄回家中之物包括兩套《聖武記》，並略述該書作者係「本年貢士邵陽魏源所編次，頗有可觀。伊又有一書曰《海國圖志》，乃林

者、內容等相關討論，參見安京，〈《海錄》作者、版本、內容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3：1（北京，2003.3），頁48-58；劉幸，〈謝清高與《海錄》〉，《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1：2（太原，2012.3），頁37-39。

¹⁰⁸ 有關《籌海圖編》作者、版本的考辨，參見李志忠，〈談《籌海圖編》的作者與版本〉，《文物》，1983：7（北京，1983.7），頁68-72；劉志軍、李又增，〈寧夏大學圖書館館藏《籌海圖編》考略〉，《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3：12（銀川，2013.12），頁118-120。

¹⁰⁹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廿八日條，頁435。

¹¹⁰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條，頁612。

¹¹¹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三十日條，頁741。

少穆譯出夷書，澳門新聞紙之類，魏源用以編輯者」。同時，略陳《海國圖志》旨趣，對於書中所云以夷制夷之法，評為「一家之言，未必遂為至論，而其書則奇書也」。但因索價六金，且恐南方亦有販售，故不復寄。¹¹²十二月，另一封家書中，翁同書再度提及：「《聖武記》不知南中亦有印賣者否？《海國圖志》此間已賣盡。魏默深今在江蘇或吳中亦有其書，其實亦不足觀。」¹¹³到了道光廿五年一月，翁同書回覆翁心存《海國圖志》已售罄，當再向別處打聽。從函札文字可知，父子兩人曾就魏源著述內容進行討論，並有共識謂其持論偏頗。¹¹⁴可惜翁心存道光廿四年年底與廿五年年初的日記盡付闕如，無法獲知更多訊息。

相較於此，昆山諸生潘道根（1788-1858）在道光廿二年八月一日，鴉片戰爭進行最烈之際，特撰〈勸戒文〉，即開宗明義表明：「天下之治亂，根於天下之人心。人心一日不悔過，則天心一日不悔禍。……然則欲撥亂而反之正，誠莫先於正人心矣。」¹¹⁵前後相關記述皆無涉域外新知內容，可謂傳統士人的標準反應。直到咸豐三年，始見潘道根借閱《海國圖志》的記錄。¹¹⁶因此，翁心存父子在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旋即關注域外新知，雖未表贊同，但可反應出翁氏父子對時事、各類知識的掌握能力及其態度。

五、結論

本文嘗試以翁心存為線索，從個人日常生活紀錄出發，輔以相關史料，探問士人與人際網絡、政治黨派、時局世變之間的緊密關連。首先，由翁心存的例子可知，不論在京任職或返鄉居

¹¹²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致翁心存函〉，頁15。

¹¹³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致翁心存函〉，頁20。

¹¹⁴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致翁心存函〉，頁25。

¹¹⁵ 清·潘道根著，羅瑛整理，《潘道根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上冊，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廿五日條，頁214-216。

¹¹⁶ 清·潘道根著，羅瑛整理，《潘道根日記》，下冊，咸豐三年十月十二日條，頁429。

住，士人莫不積極編織、經營其交友網絡，而此一網絡對士人的影響是全面且具決定性的。是故，不論在京時期與師友間的宴遊聚會、議論時事、或鴉片戰爭時期情報訊息的獲取、傳播等，莫不受到交友網絡影響。林則徐家傳「飼鶴圖」的題詠名單是另一個證據，儘管吾人將林則徐視為主戰派士人代表，但在「飼鶴圖」中題詠之人包含和、戰兩方陣營以及滿、漢士人，顯見林則徐交友網絡的權力糾葛，而翁心存亦捲入其中。

其次，細察翁心存在京期間與師友和滿、漢大臣的互動，充分顯示道光朝的官員關係錯綜複雜，並非有一涇渭分明之主戰、主和陣營，雙方互為水火，絲毫無涉。士人在此朝局中，努力構築自我或家族的網絡、權力。不論表面或實際，翁心存、林則徐等人都不得不與穆彰阿，甚或穆黨人員有所接觸，在當時的科舉制度、官場文化中，也無法避免地需要和他們維持良好關係。¹¹⁷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或許正因翁心存在道光朝與穆黨保持良好關係，故宦途順遂，翁心存始終恩眷不墜，直至咸豐八年（1858）後才因與肅順（1816-1861）不合，乞病去職。由此可知，與中央權貴的親疏遠近和宦途順遂與否確有緊密關連。

第三，翁心存不論在京或居鄉的日常活動，雖與多數士紳相似，不外乎關心族人、門生科考成敗或四處蒐羅訪求珍稀書籍等，但仍有兩點值得措意。首先，在翁心存教導下，族人和門生皆取得優異成績，透過翁氏父子記述，略可窺知士人內心私密且真切的情緒起伏，並瞭解科考對士人全方面的強力滲透與廣泛影響。其次，除了珍稀刻本書籍、拓片畫作的蒐羅外，身處鴉片戰爭前後的時代劇變之際，加上與林則徐黨人的密切關係，翁氏父子並非對西學新知毫無所悉。從有限文字可知，儘管努力蒐求、多方涉獵，翁氏父子並未全然信服，但已是努力蒐求相關書籍；與潘道根相較，可知翁氏父子已與一味拒斥西學的士人有所差

¹¹⁷ 如林則徐曾教導長子林汝舟，身為穆彰阿門生，穆彰阿喪妻時，理當前往慰唁並出一分贖金，以表心意。參見清·林則徐撰，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卷7，〈流放新疆期間·致鄭夫人、林汝舟〉，頁219-220。

異。此外，由於魏源《海國圖志》要價不菲卻仍一書難求，除了略可說明士人渴求新知的態度外，來日若有更多史料佐證，或可進一步追索該書在中國的傳播，並與傳入日本的情形進行比較研究，將可對鴉片戰爭在東亞的時代意義有更深的認識。¹¹⁸

第四，林文仁教授嘗論及：咸豐四年（1854），曾國藩率兵戰勝太平軍，咸豐帝大喜過望，「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祁雋藻旋對以「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曾國藩遂不得志七、八年之久，因此論斷此乃典型南、北士人之爭，進而申論咸豐朝的南北之爭議題。¹¹⁹然南、北士人互相輕視與對抗是否在道光朝已悄然萌芽？因翁、祁兩人關係密切，情誼深厚。且咸豐十一年（1861），翁同書因捲入「壽州紳練仇殺事件」，與權傾一時的曾國藩發生衝突。是故，翁氏家族對曾國藩，甚或湘軍整體評議，皆較為負面，且為其對國家社會造成之衝擊、影響感到憂心如焚。文字露骨，讀之即可知其憎惡之情。¹²⁰但翁心存故鄉江蘇常熟與曾國藩出生地湖南長沙相去不遠，而翁心存卻與來自山西壽陽的祁雋藻維持密切關係。故此南、北士人的判別標準為何？南、北之別係源於出生地域？抑或是士人自我認同，可自由選

¹¹⁸ 有關魏源《海國圖志》一書傳入日本的相關情形，可參見唐屹軒，〈「因陀羅網」與歷史閱讀〉，收入劉淑爾主編，《閱來越智慧》（臺中：滄海書局，2018），頁118-122。

¹¹⁹ 林文仁，《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 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頁41。

¹²⁰ 相關評述，如1866年，翁同龢致翁同龢函：「湖南一省，各省遣撤之勇，幾至二、三十萬人，此輩皆無業游民，其平素在鄉里也。多為不法，擾害良善，近來皆應募他往，故地方反得無事。今陸續歸來，其保有官職能知自愛者，甚屬寥寥，其餘皆故態依然，為橫鄉里，且在營日久，黨與眾多，往往聚眾滋鬧，莫敢誰何？」同年，翁同龢致翁翰函：「湘省散勇，雖不至遽然為匪，然漸漸已有萌動之意，即湘鄉一縣而論，保至紅頂花翎者，有二、三百人，其餘三、四品官階者，則更不知多少。此輩中打仗勇往，實著勞績者，因自有人，然濫膺保舉者，正復不少。其平時之不自愛惜，擾害閭閻，……總之，此十餘年來，天下人民盡遭塗炭，而惟湖南人士，則功名富貴歸之，子女玉帛歸之，天道好還，豈有往而不復之理。」參見清·翁同龢著，李紅英輯考，《翁同龢家書繫年考》，〈致翁同龢函30〉，頁83；同書，〈致翁曾翰函42〉，頁291-292。

擇？凡此種種，至今仍未明瞭，值得進一步探究，而翁氏家族的諸多記述或許可提供吾人深入研究的重要線索。是故，翁心存的日常生活雖僅是一小片段，卻能反映出清中葉以降即至晚清的時代脈動，並引申出許多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

（責任編輯：王亭方 校對：黃品欣）

附錄 翁心存日常生活統計表（1825-1849）

時間	記載天數	皇帝召見	宴遊聚會	會談拜謁	往來書信	備註
道光五年五月	3	0	0	1	1	福建鄉試正考官
道光五年六月	29	0	0	30	1	福建鄉試正考官
道光五年七月	29	0	0	16	0	福建鄉試正考官
道光五年八月	12	0	0	7	0	提督廣東學政
道光五年九月	8	0	3	10	1	提督廣東學政
道光五年十月	28	0	3	42	17	提督廣東學政
道光五年十一月	1	0	0	0	0	提督廣東學政
道光九年正月	29	0	1	24	4	提督廣東學政
道光九年二月	10	1	0	3	0	提督廣東學政
道光十二年十月	1	0	0	0	0	四川鄉試正考官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	3	1	0	0	0	提督江西學政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	18	0	2	12	6	提督江西學政
道光十三年正月	29	0	0	24	3	提督江西學政
道光十三年二月	13	0	0	4	0	提督江西學政
道光十四年八月	1	0	0	0	0	提督江西學政
道光十四年九月	2	0	0	0	0	提督江西學政
道光十四年十月	1	0	0	0	0	提督江西學政
道光十四年十一月	21	0	0	18	3	6 日江西學政交篆， 10 日啟程返京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	30	2	3	37	3	—
道光十五年正月	29	0	4	24	3	—
道光十五年二月	30	0	6	30	4	—
道光十五年三月	30	1	7	43	9	—
道光十五年四月	29	0	5	39	11	—
道光十五年五月	30	0	7	29	0	—
道光十五年六月	30	0	3	26	15	—
道光十五年閏六月	29	1	0	35	7	12 日得典試浙江之命
道光十五年七月	29	0	0	19	5	浙江鄉試正考官
道光十五年八月	23	0	1	4	0	浙江鄉試正考官
道光十五年九月	27	0	5	17	1	28 日回抵常熟省親
道光十五年十月	30	0	5	14	8	14 日接升奉天府丞之命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	29	1	5	31	9	19 日回抵京師
道光十五年十二月	30	1	5	33	9	13 日啟程赴奉天
道光十六年正月	7	0	0	6	1	4 日抵府丞署

時間	記載天數	皇帝召見	宴遊聚會	會談拜謁	往來書信	備註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	11	0	1	10	37	15日知補授大理寺少卿
道光十六年十二月	29	0	8	48	18	15日啟程回京
道光十七年正月	30	3	7	49	36	9日知在上書房行走，授六阿哥讀書
道光十七年二月	29	0	5	53	28	—
道光十七年三月	30	1	6	32	14	—
道光十七年四月	29	0	2	29	22	—
道光十七年五月	30	1	3	33	10	—
道光十七年六月	29	0	2	35	15	—
道光十七年七月	30	0	0	37	23	—
道光十七年八月	30	0	2	41	9	—
道光十七年九月	29	0	3	50	18	—
道光十七年十月	30	0	5	20	9	—
道光十七年十一月	29	0	1	34	6	—
道光十七年十二月	30	0	8	41	19	—
道光十八年正月	29	1	3	32	11	—
道光十八年二月	30	0	5	45	11	—
道光十八年三月	29	0	4	25	7	—
道光十八年四月	30	0	5	63	16	—
道光十八年閏四月	27	1	7	49	7	11日獲准開缺回籍終養
道光十八年五月	26	0	3	11	0	7日啟程南歸
道光十八年六月	5	0	0	1	0	5日返抵常熟
道光廿年正月	30	0	5	9	41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年二月	29	0	0	18	12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年三月	30	0	1	19	12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年四月	29	0	0	39	21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年五月	29	0	0	21	22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年六月	30	0	2	39	32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年七月	29	0	0	65	16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年八月	30	0	1	60	20	居鄉奉養母親

時間	記載天數	皇帝召見	宴遊聚會	會談拜謁	往來書信	備註
道光廿年九月	29	0	2	26	17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年十月	30	0	2	47	14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年十一月	30	0	1	30	15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年十二月	30	0	0	23	53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正月	29	0	3	20	43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二月	30	0	0	10	34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三月	29	0	0	13	45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閏三月	30	0	1	21	23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四月	29	0	0	29	20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五月	29	0	0	21	20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六月	30	0	3	14	31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七月	29	0	1	24	19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八月	30	0	2	45	13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九月	29	0	0	44	71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十月	30	0	2	28	30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十一月	29	0	0	10	25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一年十二月	30	0	0	30	17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正月	30	0	4	15	10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二月	30	0	3	33	4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三月	29	0	3	27	14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四月	30	0	1	29	13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五月	29	0	2	44	33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六月	29	0	0	21	46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七月	30	0	0	10	45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八月	29	0	0	7	43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九月	30	0	0	23	10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十月	29	0	0	29	24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十一月	30	0	0	28	20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二年十二月	29	0	1	27	12	居鄉奉養母親
道光廿五年七月	6	0	0	8	4	丁母憂

時間	記載天數	皇帝召見	宴遊聚會	會談拜謁	往來書信	備註
道光廿五年八月	15	0	1	10	33	丁母憂
道光廿五年九月	30	0	0	24	54	丁母憂
道光廿五年十月	29	0	2	20	76	丁母憂
道光廿五年十一月	30	0	0	17	57	丁母憂
道光廿五年十二月	29	0	0	16	82	丁母憂
道光廿六年正月	30	0	0	29	45	丁母憂
道光廿六年二月	29	0	0	26	22	丁母憂
道光廿六年三月	30	0	0	23	25	丁母憂
道光廿六年四月	29	0	0	15	29	丁母憂
道光廿六年五月	30	0	0	13	28	丁母憂
道光廿六年閏五月	29	0	0	8	23	丁母憂
道光廿八年正月	29	0	1	27	37	—
道光廿八年二月	30	0	7	57	22	—
道光廿八年三月	29	0	6	28	15	—
道光廿八年四月	29	0	1	17	22	—
道光廿八年五月	30	0	1	24	23	—
道光廿八年六月	29	0	2	22	22	—
道光廿八年七月	30	0	0	21	20	—
道光廿八年八月	29	0	2	30	38	—
道光廿八年九月	30	0	1	28	23	—
道光廿八年十月	30	0	3	40	21	—
道光廿八年十一月	30	0	1	25	9	—
道光廿八年十二月	29	0	1	25	37	—
道光廿九年正月	30	0	5	26	35	—
道光廿九年二月	29	0	6	42	11	5日啟程赴京
道光廿九年三月	30	1	2	26	9	26日抵達京城
道光廿九年四月	29	0	9	49	17	—
道光廿九年閏四月	29	0	9	39	28	—
道光廿九年五月	30	0	2	51	46	—
道光廿九年六月	29	0	3	51	32	—

時間	記載天數	皇帝召見	宴遊聚會	會談拜謁	往來書信	備註
道光廿九年七月	30	1	5	65	16	—
道光廿九年八月	29	0	7	56	32	—
道光廿九年九月	30	0	3	53	25	—
道光廿九年十月	29	0	2	35	17	—
道光廿九年十一月	30	0	2	63	35	—
道光廿九年十二月	30	1	0	57	49	22 日上諭補授工部左侍郎兼署錢法堂事務
小計	3,367	18	269	3,480	2,496	—

說明：

1. 本表係以《翁心存日記》的記錄為主，參酌李文杰教授〈總理衙門章京的日常生活與仕宦生涯——《懲齋日記》與楊宜治其人〉文中「表一：《懲齋日記》所載總理衙門章京的業餘生活」製作。
2. 表中的「時間」係以日記中記述之農曆日期為準，因本文所論以 1822-1849 年間為主，故僅統計這段時間的活動情況。其中，「皇帝召見」、「宴遊聚會」、「會談拜謁」的統計標準，係以次數而言，故一天內先後與不同人出遊、聚會或見面等，皆逐一計算；多人一同出遊或集體會談拜謁，則仍以一次計；而會談拜謁中，若僅遣人送帖、拒絕見面或不值未晤等，則不予計算。

資料來源：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 1 冊，頁 1-421；同書，第 2 冊，頁 423-774。

李文杰，〈總理衙門章京的日常生活與仕宦生涯——《懲齋日記》與楊宜治其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臺北，2010.12，頁 51-95。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清·王慶雲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點校，《荊花館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 清·李岳瑞撰，張明芳點校，《悔逸齋筆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 清·李星沅撰，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揚州：廣陵書社，2007。
- 清·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清·林則徐撰，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 清·孫靜庵撰，張明芳點校，《棲霞閣野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 清·徐珂編撰，《清稗類鈔》，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
- 清·翁心存著，張劍輯校，《翁心存詩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 清·翁同書著，李紅英輯考，《翁同書手札繫年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 清·翁同爵著，李紅英輯考，《翁同爵家書繫年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 清·翁同龢著，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枧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清·陳揆編，《稽瑞樓書目》，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清·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兩淮淮北士民公刊本，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藏書號：5503 7234。
- 清·管庭芬撰，張廷銀整理，《管庭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
-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標點本，長沙：岳麓書社，2013。
- 清·趙鈞撰，溫州市圖書館編，陳偉玲整理，《趙鈞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
- 清·潘道根著，羅瑛整理，《潘道根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
- 清·鄭鍾祥、張瀛修、龐鴻文等纂，《光緒常昭合志稿》，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 22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清·龍啟瑞撰，呂斌編著，《龍啟瑞詩文集校箋》，長沙：岳麓書社，2008。
- 清·魏源，《聖武記》，道光甲辰年鐫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藏書號：リ08 00677。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 老吏，《奴才小史》，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53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 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軼事輯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 黃澤德編，《林公則徐家傳飼鶴圖暨題詠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 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二、近人專書

- 丁輝、陳心蓉，《明清嘉興科舉家族姻親譜系整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 王洪軍，《清代濟寧孫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 何炳棣著，徐泓譯注，《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
- 孟森，《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林文仁，《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 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林文仁，《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以「帝后黨爭」為中心的探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 張宏傑，《給曾國藩算算賬：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京官時期）》，北京：中華書局，2015。
- 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 齊如山，《中國的科名》，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
- 蕭一山，《清代通史》，北京：蕭一山自刊，1923。
- 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謝俊美，《翁同書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許存健譯，《言利：包世臣與 19 世紀的改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 菊池秀明，《清代中国南部の社会変容と太平天国》，東京：汲古書院，2008。
- Han, Seunghyun. *After the Prosperous Age: State and Elite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uzhou*.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三、近人論文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臺北，2008.3，頁 63-93。

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頁 415-449。

王健，〈居鄉之苦：《沈竹岑日記》所見「道光蕭條」與江南鄉村社會〉，《江海學刊》，2013：6，南京，2013.11，頁 156-161。

仲偉行，〈常熟翁氏藏書源流考〉，《文獻》，2003：1，北京，2003.1，頁 207-208。

安京，〈《海錄》作者、版本、內容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3：1，北京，2003.3，頁 48-58。

余新忠、郝曉麗，〈在具象而個性的日常生活中發現歷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2，北京，2017.6，頁 82-95。

巫仁恕，〈官與民之間——清代的基層社會與國家控制〉，收入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頁 423-474。

李文杰，〈總理衙門章京的日常生活與仕宦生涯——《懲齋日記》與楊宜治其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臺北，2010.12，頁 51-95。

李志忠，〈談《籌海圖編》的作者與版本〉，《文物》，1983：7，北京，1983.7，頁 68-72。

邱澎生，〈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辯證〉，《新史學》，17：4，臺北，2006.12，頁 1-14。

封磊，〈一個京官的日常生活——以《翁曾翰日記》為中心〉，《常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2，常州，2018.3，頁 106-116。

凌索超，〈論曹振鏞的治學與為政——關於「清慎勤」的解讀〉，《哈爾濱學院學報》，34：8，哈爾濱，2013.8，頁 98-101。

- 唐屹軒，〈「因陀羅網」與歷史閱讀〉，收入劉淑爾主編，《閱來越智慧》，臺中：滄海書局，2018，頁 110-124。
- 常建華，〈日常生活與社會文化史——「新文化史」觀照下的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12：1，北京，2012.1，頁 67-79。
- 常建華，〈他山之石：國外和台灣地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啟示〉，《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合肥，2015.1，頁 15-25。
- 連玲玲，〈典範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新史學》，17：4，臺北，2006.12，頁 255-281。
- 郭燕紅，〈從常熟均賦到昭文民變——清道光晚期江南社會危機透視〉，《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3，重慶，2016.5，頁 169-176。
- 陳鵬鳴，〈魏源《聖武記》初探〉，《書目季刊》，29：2，臺北，1995.9，頁 47-55。
- 黃寬重，〈科舉、經濟與家族興替：以宋代德興張氏家族為例〉，收入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秘書處編，《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96，頁 127-146。
- 黃寬重，〈科舉社會下家族的發展與轉變——以宋代為中心的觀察〉，《唐研究》，11，北京，2005.12，頁 337-353。
- 趙思淵，〈十九世紀中葉蘇州之「大小戶」問題〉，《史林》，2012：6，上海，2012.12，頁 77-86。
- 趙思淵，〈士氣之藩籬：清末常熟清賦中的士紳身分意識轉變〉，《歷史研究》，2016：6，北京，2016.12，頁 70-85。
- 劉志軍、李又增，〈寧夏大學圖書館館藏《籌海圖編》考略〉，《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3：12，銀川，2013.12，頁 118-120。
- 劉幸，〈謝清高與《海錄》〉，《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1：2，太原，2012.3，頁 37-39。
- 劉海峰，〈「穆黨」對道光朝晚期吏治的影響〉，《史學月刊》，2007：3，開封，2007.3，頁 46-50。
- 魏秀梅，〈曹振鏞政績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臺北，1999.6，頁 51-87。

羅威廉 (William T. Rowe) 著，師江然譯，〈乾嘉變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清史研究》，2012：3，北京，2012.8，頁 150-156。

羅曉翔，〈晚清江南社會的紳權與信任危機：以常熟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3，臺北，2019.3，頁 47-89。

顧文婷，〈清代歙縣雄村曹氏家族詩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岡田英弘，〈世界史のなかの大清帝国〉，收入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頁 59-73。

Jones, Susan Mann and Philip A.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Late Ch'ing, Part 1, 1800-1911*,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pp. 107-1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四、其他

許明德，〈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教授演講「乾嘉變革的再思考」紀要〉，《明清研究通訊》，75，臺北，2019.1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787〉(2019/10/18)。

The Life of a Government Official during the Late Qing Era: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Weng Xincun

Tang, Yi-hsuan*

Abstract

What was life like for a government official during the Daoguang period (1820-1850)?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the life of Weng Xincun (1791-1862). He is especially suited for such a task, for he lived in the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before returning to his hometown in the countryside to mourn for his deceased mother: his life in Beijing gives us some idea of what it was like to be a government official living in the capital, while his time in the countryside sheds light on the concerns of the country gentry. In the capital, we see Weng maintaining a network of friendships with the literati through frequent parties attended by colleagues and former classmates. In the countryside, we find him discussing local affairs and national politics. Through Weng, we are able to grasp how complicated relations were between Manchu and Han officials during the Daoguang period. Caught in between these two parties, Weng was able to remain above the fray. Through the friendship between Weng and his close friend Qi Junzao, we gain further insight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on the north-south divide. These and many other issues worthy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are raised by an examination of the life of Weng Xincun.

Keywords: Weng Xincu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Literati Network, Daily Life

* Assistant Professor, Fundament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